

##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战备和边防工作

陈国裕\*<sup>1</sup>

**摘要** 独立自主发展高科技军事手段,打造国防建设的杀手锏,形成我国的战略威慑力量;掌握战略导弹、运载火箭、空间卫星技术制高点,组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强大的陆海空军。兵民结合,筑牢钢铁长城;建立和完善边防工作体制和管理制度;新疆军区全面管辖边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是边防斗争的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实行“三代”;加强民兵建设,开展军民联防;把发展边境地区民兵组织作为民兵建设的重点。

**关键词** 周边态势 战争研判 战备 边防

中国图书分类号 E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741(2016)03-0049-14

###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严峻的周边态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周边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向我东北、西北方向的中苏边界,华北方向的中蒙边界不断增兵,一度陈兵百万,边境气氛紧张。反华势力默契配合,苏联于1962年在我国伊塔地区制造边民外逃和暴乱,印度则连续多次入侵中印边境西段新疆地区,深入中国领土设立新的军事据点,枪击中国居民,从事挑衅活动。

在我国西南方向,印度谋求南亚地区霸权,不断侵入我国边境,大肆蚕食侵占我国领土,并悍然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我国边防部队毙、伤、俘印军准将旅长达尔维以下官兵8700余人,其中俘虏3942名。印度国内鼓噪反华,掀起残暴迫害华侨浪潮,1963年4月,我国“光华轮”和“新华轮”接送迫害华侨首批回国。印军遭重创,一度有所收敛,但不久又频繁侵略我国领土、领空。1965年,印军挑起边界武装冲突,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将其击退。1966年,印军侵犯我国领土73次,侵犯我国领空71次。1967年,印驻华使馆二秘犯间谍罪被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处“驱逐出

境,立即执行”,印军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攻击,我被迫自卫还击。1971年,印武装人员和飞机多次侵入我国境内进行侦察,印政府纵容印度人和西藏叛匪到我驻印大使馆前挑衅。1975年,一股印武装人员在中印边界东段土伦山口侵入我国西藏境内,向我国民政检查站人员开枪挑衅,我国民政检查站人员在被迫自卫还击中击毙印军4名。<sup>①</sup>

在我国东南方向,美国扶持武装台湾蒋介石集团,并直接派遣军舰、飞机在我国沿海骚扰,拉拢一些国家构筑反华包围圈。蒋介石集团始终沉湎于“反攻大陆”的迷梦之中,徒劳地重复着对我国大陆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1955年12月,解放军18天内击落台军飞机18架。1957年,美国在台湾驻扎导弹部队。1958年2月,我海军航空兵在山东即墨县上空击落台军喷气侦察机1架;同年8月,福建前线鱼雷快艇和炮兵击伤、击沉台军军舰各1艘;同年9月,美18艘军舰、2架飞机先后6次侵犯我国金门、厦门地区领海和福建、江西、广东等省领空。台空军在美指使下,使用导弹武器向解放军空军进攻。1959年10月,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上空击落台空军RB-570型高空侦察机1架。<sup>②</sup>

\* [作者简介]陈国裕,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编审。

20世纪60年代,美蒋集团妄图乘我国大陆经济困难之机实现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多次派遣间谍收集情报,密集组织武装特务窜犯东南沿海。1960年3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1名美国间谍有期徒刑20年;同年5月,《人民日报》社论《第一百次警告》指出:自1958年9月7日因美国军舰侵入中国领海受到首次警告起,到现在美国军舰侵入我领海88次,军机侵入我领空242架次。我国公安部发布公告:1962年四季度,边防部队和民兵歼灭海上登陆、空投的9股美蒋武装特务172名。1963年上半年,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军民歼灭6股从海上登陆的美蒋武装特务;到同年11月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军民歼灭9股偷渡登陆和空投的美蒋武装特务。1963年11月至1964年6月,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军民歼灭9股美蒋武装特务70余人,缴获和击沉船艇11艘。1964年7月至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军民歼灭7股美蒋武装特务196人,缴获和击沉运载武装特务船艇8艘。

此外,美蒋集团还频繁、密集地对我国大陆进行空中、海上的侦察挑衅及其他破坏。1962年8月2日,我高炮部队在福州上空击落台军RF-101型侦察机1架并俘获飞行员;同年8月5日,台特务在由澳门进入大陆的旅客行李中安放烈性炸药,制造了炸死、炸伤回乡探亲旅客20多人的血腥事件;同年8月29日,台特务再次在深圳制造爆炸事件,炸死、炸伤香港游客3人,杀害边检人员1人;同年9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台军U-2型飞机1架。1963年2月,台当局与美伞兵在台湾南部联合举行空降演习;同年6月,我空军击落美制台军F-2V型飞机1架;同年11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台军U-2型飞机1架。1964年6月11日,我海军防空部队击落美制台军P-2V型飞机1架;同年6月13日,美机轰炸我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驻地;同年7月,我空军击落美制台军U-2型飞机1架;同年11月,我空军在中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12月,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美制台军RF-101型飞机1架;同年12月间,美北极星导弹潜艇赴亚洲大陆沿岸海面进行战争挑衅。

1965年1月2日,我空军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

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1月10日,我空军在华北上空击落美制台军U-2型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3月18日,我空军在东南沿海上空击落美制台军RF-101型飞机1架;同年3月31日,海军航空兵部队在华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4月3日,我空军在中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4月9日,8架美军飞机侵入海南岛上空,我空军及时应战,美机逃窜中自伤1架飞机;同年4月18日,我空军在中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8月6日,我海军击沉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台军军舰“剑门号”和“章江号”。同年8月21日,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华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9月,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战斗机1架,并活捉美军飞行员;同年10月,我空军在广西上空击落美军战斗机;同年11月14日,我海军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击伤美制台军军舰各1艘;同年11月22日,美机轰炸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及新华分社驻地。1966年2月,我空军在西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3月5日和23日,我空军在中南、西南上空各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同年4月,我空军在雷州半岛上空击落美A-3B重型攻击机1架。1967年1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台军F-104型战斗机1架;同年四五月间,我空军在广西上空先后击落入侵美军用飞机5架;同年6月,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上空击落美军F-4C型战斗机1架;同年9月,我空军在华东上空击落美制台军U-2型高空侦察机1架,这是1962年以来击落的第5架U-2型高空侦察机。<sup>③</sup>

1968年1月,我空军在云南上空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此后同年3月7日、15日、22日,我空军分别击落3架入侵云南、广西的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此前同年2月,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击落2架入侵海南岛的美军A-1H型舰载攻击机,1968年,我国共击落入侵美军飞机6架。1969年10月,我空军击落美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1架,这是自1964年以来被我空军击落的第17架美国同类飞机。<sup>④</sup>

在我国的南海,美国及其扶持的南越当局对其骚扰不断。南越军队1957年3月侵占我国西沙群

岛的甘泉、珊瑚、金银诸岛,打伤我国渔民;以后南越当局多次侵犯我国主权,劫掠我国渔民;非法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10多个岛屿。美鼓动老挝右翼势力在中老边境策划军事阴谋,伙同泰国侵略、干涉老挝,破坏日内瓦协议,制造老挝紧张局势;此外,美伙同亲美势力干涉和侵略柬埔寨。1961年,美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1964年,美借口“东京湾事件”武装侵略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1965年3月,美扩大越南战争,对我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对我国构成战争威胁。1965年年初,美海军陆战队进入南越,同年6月直接参战,同年8月增派5万名美军士兵进入越南南方。同年10月,应胡志明要求,我国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1971年2月,美发动对老挝南部的大规模入侵。1972年5月,美军舰和飞机连续袭击停泊在越南海面的我国商船;同年8月,美飞机轰炸停泊在越南海面的我国商船所属的一只救生艇,我国5名船员被炸死。1974年1月,我海军南海舰队执行西沙自卫反击战,收复被南越侵占的西沙群岛的甘泉、珊瑚和金银等3岛,俘虏南越军官兵48人、美军联络官1人,击沉敌护卫舰1艘,击伤敌驱逐舰3艘,击毙、击伤敌100余人。1975年以后,越南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制造事端,挑起纠纷,企图侵占我国领土,我国多次向越南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越南方面以种种借口加以拖延。越南在向西贡进军、解放越南南方的同时,公然派出军队侵占属于我国南沙群岛的6个岛屿,继而向我国提出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领土要求。我外交部于1975年5月向越南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同年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访华,邓小平与黎笋会谈,就越南在报刊上加紧宣传所谓“北方的威胁”、向我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和在中越边境蓄意制造纠纷等问题,表示中国方面对此感到不安。<sup>⑤</sup>

此外,其他国际反华势力也加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遏制中国的反华“大合唱”,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华浪潮。美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围堵中国,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领土上建立核武器和海空基地。菲律宾早就觊觎我国的南沙群岛。印度尼西亚政府大规模反华排华,1960年2月,我国首次派4艘轮船赴海外接运归国华侨,遭受印度尼西亚当局迫害的2100多名华侨回归祖国;同年5月,印度尼西亚三

马林达军事当局竟然用武力软禁我国领事;同年7月,印度尼西亚爪哇军事当局悍然枪杀我华侨。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公然袭击、搜查我商务参赞处;同年十一月间,印度尼西亚右派疯狂迫害乃至虐杀我华侨的暴行愈演愈烈。其后,印度尼西亚反华排华暴行持续升级并蔓延,发展到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伙同暴徒袭击和破坏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制造打伤我外交官员、枪伤我使馆工作人员的血腥事件。1967年4月,印度尼西亚军警公然包围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劫持我驻雅加达总领事。此外,缅甸也发生大规模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针对国际反华势力掀起的反华浪潮,1963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1965年11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编辑部文章《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sup>⑥</sup>,予以揭露和驳斥国际反华势力的丑恶行径。

此外,与我国东部邻近的东北亚也不平静。朝鲜半岛的朝韩长期对峙,战争的阴霾一直笼罩在这一地区。美公然驱使南朝鲜军队参加侵越战争。1960年1月,日美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美扶持日本军国主义余孽,日本政府右翼势力充当美在亚洲从事侵略活动的工具,日本不思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滔天侵略罪行,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继续敌视我国,并在东南亚扩张。1970年8月,美驻日大使馆发言人声称,“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已归还日本”。日本政府竟要在钓鱼岛探采石油。1970年至1971年,台湾学生和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动了一场保卫钓鱼岛的爱国运动,即“保钓运动”。1971年,美和日本通过所谓“归还冲绳协定”,公然把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等非法划入日本“归还区域”。这是对我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同年12月,我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予以谴责,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对中国领土的侵占。<sup>⑦</sup>

## 二、中央对战争问题的研判

居安思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56年即确定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sup>⑧</sup>进入国际风云变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充分做好应对国家周边可能发生的严峻事态,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保障国家根本利益,成为我国核心利益的重要关切点。

一方面,我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面临来自多方面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美苏争霸矛盾上升,美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苏联趁美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局势,美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开始考虑联华遏制苏联,对中国作出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利用超级大国间的利益矛盾与战略调整,我国适时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和调整国际战略,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起来考虑,逐渐强化对苏的防范和防御。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不断提出苏联攻打我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我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对此,“我们要准备”。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强调: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同年9月,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1966年7月,刘少奇发表声明:中国准备承担最大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战胜美帝国主义。<sup>⑨</sup>由此,我国经济建设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也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

1969年3月初至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举行20多次国际形势座谈讨论会,同年7月,他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前后共呈递4份报告,这些报告对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就外交方针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中央调整外交战略、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sup>⑩</sup>1970年12

月,毛泽东会见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说,如果尼克松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4月,毛泽东决定立即邀请美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开启了“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同年7月,周恩来和基辛格举行会谈,同年7月16日双方发表公告,尼克松应邀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sup>⑪</sup>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对于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争取中国安全形势改善,营造新的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化解美苏对我夹击的严峻形势,都需要以“和”、“战”两手应对,促使我国必须做好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变的充分准备。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个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打仗。必须立足于外部势力发动侵略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sup>⑫</sup>我国的这种大规模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影响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敢战方能言和,言和更需备战”。中央采取的积极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 三、全民动员,加强战备

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突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寓兵于民,全民皆兵”,这一方针指出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基点,明确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着力点,为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提供了战略指导。

#### (一) 全民动员,大办民兵

1958年9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分析国内外形势,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反对美在台湾海峡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挑衅;周恩来就美国务卿杜勒斯声称要在台湾海峡扩大对我国的侵略范围一事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土,任何外来干涉,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我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军舰入侵我国领海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同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后发表重要谈话,提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还要大办民兵师。随之召开的全国民兵现场会议主要讨论了全民皆兵的问题。<sup>⑬</sup>

1960年1月,总参、总政联合召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讨论民兵的战略地位,研究构成全民防御网的民兵战略布局,开展民兵工作的方法,提出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同年当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军队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随后,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致全国民兵的倡议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一贯致力于争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但是否能和平,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美国。对侵略者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彻底地揭露和斗争,才能挫败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sup>⑭</sup>1962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965年9月,总参、总政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民兵三落实工作,一旦敌人入侵就把它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陈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重要牺牲。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给我们,那就欢迎他早点来,欢迎明天就来。<sup>⑮</sup>

### (二) 布局纵深 建设三线

1964年第二季度,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sup>⑯</sup>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三线问题。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工厂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有自己的二、三线,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sup>⑰</sup>1965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加强对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同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加速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藏粮于民”<sup>⑱</sup>。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强调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

建设好。<sup>⑲</sup>《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动员“藏粮于民,储粮备荒”。其后,毛泽东在鲁、皖、苏、沪等地视察,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1968年第二季度,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小三线建设工作会议。1969年年底,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加强对国防建设的领导。为适应战备和三线建设需要,1969年以来,全国共有50多所大专院校从大城市迁往大小三线地区、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和靠近生产基地的地方。<sup>⑳</sup>我国以积极的战略防御应对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

### (三) 防范突袭 加强防空

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强化了战争威胁加剧的估计。1969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sup>㉑</sup>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准备打仗”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我国1969年国防战备费用比上年增长34%,以后的两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以上。同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的指战员,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此后,中共中央决定,为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紧急疏散在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老同志也全部战备疏散。1971年,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在北京举行,确定全国人防战备工作的重点城市方案及构筑人防工程的要求。1972年年底,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至此,我国开展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略运动。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每年专列人防经费4亿元,国家还要求地方每年自筹1亿元,集体企业每年自筹1亿元,并结合民用建筑建防空地下室每年自筹4亿元,用于人防工程建设。<sup>㉒</sup>

### (四) 备战备荒 深化训练

1970年第一季度,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制定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四五”计

划纲要(草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口号,强调“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第三季度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三项议程中的第三项就是讨论加强战备问题。此后,毛泽东对军队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包括省地属市)学校在寒暑假进行分期分批野营拉练,以后连续三四年全国的学校都按要求进行了训练。1971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战备指示,要求各大军区立即做好应付苏军进攻的准备。1972年4月,中央军委指示“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要求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亲自任教,担任队长、排长、班长;全军各大单位要在两年内把基层干部轮训完毕。全军反坦克武器展览、表演汇报领导小组举办反坦克武器展览和表演汇报,推动全军开展反坦克研究与训练。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向国内外公开宣示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方针性的口号。<sup>23</sup>1975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sup>24</sup>。同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部队“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根据这一指示,解放军三总部成立总部训练小组,主抓军队训练,当年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共组织17次军事演习,全军军事训练出现了好的形势。1976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国家计委、商业部和总后勤部《关于建设地下战备粮库的报告》,同意将地下战备粮库的建设范围安排在“三北”陆地防御要点、重点设防岛屿和适当安排“三北”几个军区的后方基地;将地下战备粮库列入国家基建计划。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新疆军区在戈壁沙漠地区结合原子弹实爆试验,组织陆军师进攻性演习,副总参谋长李达和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现场指挥了当量为3.8万吨的氢弹空中爆炸。这是我军第一次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实兵演习。<sup>25</sup>

#### 四、打造国防建设的杀手锏 提高军队技术装备水平

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关心国防、军队建设。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

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同年7月,毛泽东等接见再次击落美制U-2型飞机的空军部队。<sup>26</sup>

#### (一) 独立自主发展高科技军事手段,打造国防建设的杀手锏,形成我国的战略威慑力量

1958年6月,在苏联帮助下,我国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同年9月,我国由苏联援助建成的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北京移交生产。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随后撤走苏联专家,中苏全面停止合作。1959年,我国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强调必须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次年,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等15人组成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直接全面领导原子能事业。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此后,中国的核武器技术不断提升。1965年5月,在西部地区又成功爆炸一颗原子弹。1966年5月,在西部地区首次成功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同年12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1968年12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氢弹试验。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同年9月29日,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氢弹爆炸。1970年10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核试验。1971年11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1972年1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1973年6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氢弹试验。1974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强调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1976年9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核试验;同年10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氢弹试验;同年11月,我国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sup>27</sup>我

国战略威慑能力的提高,有效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二) 掌握战略导弹、运载火箭、空间卫星技术制高点,组建战略导弹部队

1958年3月27日,我军在甘肃某地组建第一个导弹试验训练基地。1959年7月6日,我国第一支地对地导弹部队组成。随后我国七机部成立,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1965年,中央专委会批准中科院发展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1966年7月,我国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第二炮兵由地对地导弹部队组成,是我国实现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核打击力量。1968年,我国国防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建制归国家科委。此前,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试验成功。1964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月,我国第一枚地对地中程导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同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地对地导弹在甘肃某地发射成功。1970年,我国在甘肃某基地成功进行地对地导弹飞行试验。<sup>③</sup>我军战略威慑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3月3日,我国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7月26日,“风暴1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自行研制的卫星——重达1107公斤的“技术试验卫星1号”。这是我国首次把重量超过1吨的重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年11月26日,我国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并按预定计划将卫星收回地面。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同年12月,我国成功发射“技术试验卫星2号”。1976年8月,我国成功发射“技术试验卫星3号”;同年12月,我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于10日准时返回地面。这是我国自1970年4月以来发射的第7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3月以来,我国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狠抓七机部整顿,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科研取得明显进展,下半年我国连续成功发射3颗人造卫星,在当时被誉为“三星高照”<sup>④</sup>。

(三) 建设强大的陆海空军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1958年,解放军普遍推广“试验田”,首长下连队和士兵同吃、同住、同操练;10万干部下连当兵。此后近20年间,中央军委颁发《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和《步兵战斗条令》。三军官兵开展“四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连队运动。中共中央先后批准颁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多项军队建设重要条例。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中央军委部署研究陆军步兵部队的编制问题。我国1975年的步兵师比1962年的步兵师在火力配置、机动能力上都显著提高。中共中央批准军队常规武器十年发展规划。中央军委成立常规武器发展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部队装备体制和武器装备发展方向、科研、生产和定型等工作。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就我国电子对抗存在的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指示中央军委多次研究,中央军委随后提出《关于加强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获毛泽东批准。1976年2月,总参谋部成立第四部(电子对抗雷达部)。在以后的几年中,又相继增建了若干个电子对抗团(营)和反雷达伪装团。<sup>⑤</sup>

1963年2月,我国组建海军岸对舰导弹大队,这是我军的第一支岸对舰导弹部队。“文革”开始核潜艇研制工作遭受严重干扰,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特别公函》,坚决确保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完成,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生产和借口停产。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于1968年开工建设;1971年,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代第一艘中型导弹驱逐舰交付海军使用;1974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此我国海军进入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该艇于1970年12月26日建成下水。毛泽东还对海军发展提出要求“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海军党委向毛泽东报告,要“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的海军”。毛泽东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1975年,我军的第一艘导弹护卫舰编入海军舰艇部队服役,代号为053H型。1976年,为给我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提供远洋水文气象保障,

海军组织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2号”,对南太平洋海域进行海洋水文和海洋气象等多方面的综合科学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远洋调查。1971年,国产红旗3号地对空导弹开始装备空军部队。1973年,空军制定武器装备发展规划,提出抓紧进行歼-7型改型飞机和歼-8型飞机的试飞,争取早日定型;研制轰-5型飞机的后继机和低空性能良好的强击机,以打坦克为主要任务。<sup>③</sup>至此,我国陆海空三军的技术装备和综合战力不断提升。

### 五、巩固新疆边防的战略举措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外与多国毗连,内与甘青藏为邻。这里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资源丰富,是中国联接欧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新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显示了其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祖国西北门户,新疆对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稳定有着重要意义。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0月进驻新疆,肩负起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重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为巩固新疆边防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新疆成为全国战备和边防工作的重点部位。

#### (一) 兵民结合,筑牢钢铁长城

1965年7月,周恩来视察新疆时指出“新疆既是后方,又是前线,国防工作非常重要。不仅正规部队要加紧训练、备战,就是民兵特别是基干民兵也要认真训练,要像内地民兵比武那样。”“这里的工作做好了,不仅影响全国,还会影响世界。”1966年3月,邓小平听取王恩茂汇报时说“新疆大有可为。经济上搞好了,就是军事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除了搞几个地方军工厂以外,还要搞民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这等于正规军。你们要把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起来。”<sup>④</sup>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于做好新疆的经济、军事工作,加强战备和民兵建设,经略新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驻疆部队体制编制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先后组建并逐步完善各级军事机构,军队整编,分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1954年组建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既组织生产又执行军事任务。新疆军区1955年直属国防部领导后,部队逐步由单一步兵发展为多兵种合成军,驻

疆部队军事训练按照中央军委训练大纲施训。1964年,新疆军区全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培养尖子分队和尖子士兵,逐级组织大比武,军事训练达到高潮。解放初,新疆部分地区建立民兵组织,后停止;20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大办民兵师”的形势下,新疆民兵组织得以大发展,到1965年新疆各族民兵超过百万,编成师、团、营、连等组织。<sup>⑤</sup>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中印关系恶化,边境多事。印度军队1959年制造入侵空喀山口事件,并于1962年10月向我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新疆边防部队奉命在西段进行自卫反击作战,拔除了印军在中印边界我国境内建立的全部据点。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边境紧张形势加剧,苏军破坏中苏边界现状,武装挑衅不断升级,于1969年发生了多起打死、打伤我国军民的事件。新疆边防部队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有力的斗争,加强边防建设和军民联防。执行中共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在新疆各族军民中进行战备教育,加紧后方建设,开展人民防空工作。按照中央军委部署,采取措施加强部队建设,突出以打敌人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训练和冬季野营拉练。新疆民兵建设向多兵种发展,武器装备也有改善,至1976年,全疆各族民兵达到200万人。<sup>⑥</sup>新疆边境防务形成以边防部队为主,边防部队、边防警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农场、边境地区民兵联防的“四位一体”格局。

#### (二) 建立和完善边防工作体制和管理制度

新疆和阿里地区的边境县共有36个,分属10个地州。在这些边境县内有地方的农牧业、厂矿企事业单位,有机关、学校,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师的农牧团场。在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由自治区党委一名书记担任组长,军区分管边防的副司令任副组长的自治区边防领导小组,领导成员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领导,以及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边防领导小组分别在自治区和军区设办事机构,并予以明确分工:边境军事工作由军区负责;涉外事务由外事部门和军区共同负责;治安管理由公安部门负责。在边境地州、县,建立地州、县两级边防委员会,后改称边防领导小组,由当地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组成,地方党委主管边防工

作的书记任主任(组长),军分区、人武部、驻军和外事、公安、农牧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各级边防委员会(领导小组),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遵照上级有关方针、政策、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具体研究、指导和统一部署本地边防工作。各级边防委员会(领导小组)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建立工作制度。边境人民公社、农牧团场也成立边防领导小组,由公社、农牧场、边防站、边防公安派出所的负责人组成,公社、农牧场的主要领导任组长。各级边防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边防情况,检查边境管理、边防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总结工作,交流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其办事机构设在军分区、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门。各级边防领导小组除接受各级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外,并接受上级边防领导小组的工作指导。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边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20世纪70年代初,新疆边境各县人口达到150多万,少数民族占69%左右,组建各族民兵近30万人。新疆边防部队分别属南疆军区、北疆军区、东疆军区所辖的10个军分区领导。此外,新疆边境区内还有武装公安民警。

新疆边境地区先后实行过三种管理制度:一是建立边境警戒地带。1962年,在新疆部分地区国界线本侧数十千米纵深处,有步骤地建立边境警戒地带。根据地理条件和新疆边防部队、兵团民兵值班连、地方民兵分布情况,实施管理。边境警戒地带的活动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军分区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三方面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形成较完整的防卫网络。二是划定边境禁区。1963年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将新疆大部分边境地区国界线本侧纵深20千米左右范围内划为禁区,按照“既便于实行严格管理,保障边境社会秩序安宁,又便于群众生产生活;既注意行政区划的统一领导管理,又根据地理自然条件差别,因地制宜”的原则,禁区内实行居民证制度,加强户籍管理,控制外来人员。在各级边防委员会的领导下,由边防部队、公安机关、民兵等分工负责、分片包干实施。三是划分边境管理区和边境地区。1979年5月,将新疆边防地带的20多个县市划入边境管理区,10多个县市划入边境地区。对“两区”常住居民和暂住人员实行户口管理,对临时进入人员实行通行管理。临时进入人员须持本人所

在地公安机关办理的通行证。对边境各族人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边境管理教育,学习有关政策规定,了解边界线和国界标志,遵守边防管理,严守国界,爱护国界标志,管好牲畜,不越界放牧、赶畜,有条件的要设置铁丝网等。

### (三) 新疆军区全面管辖边防

新疆军区管辖的边防,含新疆和阿里地区,边防线全长6670余千米。分为中蒙(西段)边防线、中苏(西段)边防线、中阿边防线、中巴边防线、中印(西段、中段)边防线、中尼(西段)边防线。1949年12月,二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1个连接管国民党蒲犁边卡大队防务,标志着新疆军区部队担负起保卫祖国西部边防的重任。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新疆边防管理体制几经调整,军队和公安机关先后管理边防工作,并时有交叉;1962年后,新疆部分边防逐步移交军队,从1964年开始,新疆边防和阿里边防都由新疆军区负责。国家为了维护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强化边防检查,加强了边防检查工作和边防检查体制与制度建设。1965年4月,周恩来发布命令,公布并实施《边防检查条例》。1974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边防检查站人民武装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请示报告》。根据建站以来的历史经验,边防检查站必须作为一支武装队伍进行建设和管理。<sup>⑤</sup>1965年后,新疆边防站改变体制编制,边防部队进行大的调整,部队装备有很大的改善和加强,逐渐形成在新疆军区领导下,省级军区、军分区、边防部队划区管辖,组织比较完善的边境防务体系。

新疆边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遵照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各项规定,履行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责任。具体任务有:保卫国界,查看、维护国界标志,同侵犯国家主权的势力作斗争,维护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熟悉边界历史和现状,在边境一线地区执行观察、巡逻、潜伏等勤务,及时发现和处理非法入境的人员、牲畜、车辆、飞机等,防范和打击潜入潜出的敌特及企图外逃人员,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熟悉边境地区社会情况,协同边防武装警察开展工作,协同人民武装部门做好民兵工作,搞好军民联防;掌握进入边境一线和争议地区生产、勘察等人员、车辆的活动情况,督促其遵守边防政策,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验证,维护

边界秩序,防止发生和及时处理越界事件;负责与邻国边防机关的会谈会晤工作,协同外事部门处理边境涉外事务,及时请示报告涉外事务,特别是国界问题,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做好群众工作,积极支援边疆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认真贯彻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提高警惕,应付突发事件,必要时依托自卫阵地进行战斗,并迅速上报情况;结合边防特点,有计划地进行与所遂行任务相适应的训练。

(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是边防斗争的重要力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其武装军事机构和民兵、预备役队伍,是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备战防边的一支坚强的后备力量,是新疆强边固防的一支战略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边境管理线长达2019千米,其中,中苏、中蒙边境线分别为1448千米、571千米。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建立各级武装军事指挥机构。1961年1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武装处,各师设立武装科,各团场配备武装工作专职干部。以后,其武装机构体制编制逐步调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装处扩编为武装部,各师武装科扩编为武装处,各团场建立武装股(科)。1958年,在“大办民兵师”的号召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13个民兵营,另建5个民兵连。1960年1月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组建民兵连32个,有基干民兵2234名。伊塔事件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148个齐装满员的值班连队,到1966年上半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组建值班连446个。<sup>④</sup>1967年年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达651个,共5.5万人,其中,边境地区团场值班连队136个。此前,1962年10月,总参谋部发布《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组编与装备等问题的规定》,明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性质是一支不脱离生产的、劳武结合的、按国防军部队的编制和装备组建起来的战斗队,利用生产间隙进行必要的战术、技术训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班连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建设边境警戒地带。20世纪6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兵军事训练主要突出“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的训练,在训练中广泛开展创“三手”(特等射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活动。进入20

世纪70年代,在抓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战术等五大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又突出了以打坦克、打飞机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使训练提高到新的层次。1975年3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其武装机构和民兵工作转交所在地区的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负责,值班连队改称武装基干民兵连。<sup>⑤</sup>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符合预备役条件的人员,分布面广,相对集中,潜力很大。1964年年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战时武装力量动员计划,以年龄在18~40岁、政治纯洁、身体健康的男职工为动员对象,可组建10个步兵师。为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预备役力量建设,1964~1965年,中央军委调给兵团转业干部数百人,动员各大军区退伍士兵2万余人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充实了新的血液。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员的增加,其武装工作不断加强,196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师组建1个现役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力量,坚持劳武结合,亦兵亦农,在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实行“三代”

1962年以前,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状态。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及苏侨协会的长期策动、诱骗下,1962年,伊犁、塔城地区边境居民6万多人越境逃苏。塔城、裕民等县减少劳动力58%以上,9个公社、7个牧场基本解体,当地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霍城县3个公社越境人员占70%。边民外逃正值春耕季节,播下的作物无人管理,产羔育幼停顿,畜群无人看管,伊塔两地损失牲畜23万多头,荒芜良田40多万亩,加上一些地方粮仓和商店、社队集体财产被哄抢,整个损失达7000多万元。

伊塔事件后,按照中共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武装民兵连队开赴边境第一线,建立哨卡、检查站、巡逻哨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边境局势;派出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劝导边民回乡,对边境地区社队农牧业生产进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帮助边境地方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边境地区建设边境农场,逐步构筑起边境农场防护带。

为巩固边防,恢复和发展生产,重建各级组织,加强民族团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于1962年5月5

日组织“三代”工作队,选派干部810名,工人16750人,汽车39辆,拖拉机和收割机45台,开赴指定地区。“三代”工作在边境一线充实武装力量,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协助地方恢复生产。为使“三代”工作队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群众纪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制定了《三代工作队守则》,要求一切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积极工作,看护人民财产,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服从领导听指挥。强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代”工作队应该是为各族人民大办好事的服务队,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帮助地方对外逃的各族群众留下的耕地、牲畜、财物进行无代价的“三代”,以待其重返家园后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他们。为重建当地基层组织,“三代”工作队代理公社一级职务的干部54名,代理大队一级职务的干部199名,代理小队一级职务的干部499名,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春播任务4万多亩,将32.7万余只(头)牲畜收拢,使塔城、裕民两县的生产很快走向正规,并重建两县农村各级组织,使当地社会秩序和治安恢复正常。同年8月,“三代”工作队将代耕的土地和代牧的牲畜,全部移交当地人民政府。<sup>⑧</sup>在霍城县3个公社负责“三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干部职工就达4500多人。

#### (六) 组建边境农牧团场

1962年下半年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边境地区建设边境农牧团场,以连成一条农场带,作为边防的屏障。同年11月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向自治区党委上报《关于建设边境农场的报告》。同年11月28日,自治区党委批复,就有关建场原则、土地划拨方案以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规定。在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边境划出117.33万公顷土地,作为边境农场用地。至196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成边境农场38个,耕地15.61万公顷,人口达15.5万人,其中职工有8.21万人。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在边境二线陆续建立20个边境农场。至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中蒙2019千米的边境线上,建成边境农场58个,耕地28.86万公顷,总人口达38.41万人,职工有16.08万人。新疆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纵深10~30千米的边境农场带,构筑起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

边境农牧团场的组织形式,适应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双重任务的根本要求。张仲瀚于1962年11月18日指出“边境农场既搞生产,又做地方工作,又搞武装,担负边防任务,这个三结合,体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这条农场带,不是单纯的生产带,而是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一条边境警戒线。”多年来,边境农牧团场在发展自身的同时,积极支援边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如农四师六十二团20年间帮助周边社队犁地1917.4公顷,播种2466公顷,脱粒100万公斤,打草89万余公斤,支援种子14万公斤,派出技术人员127人次,治病7332人次,修水渠730千米,支援劳动力1.9万余个,以实际行动密切了边境农场和当地群众的关系。<sup>⑨</sup>

边境农牧团场实行劳武结合,寓兵于农,寓兵于牧,形成具有兵团特色、适合新疆特点的管理形式。根据边境农牧团场人数多、布点广和巩固边防的需要,遵循“边防管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边境农业团场采取“生产经营地段与边防管理地段合一”的办法,边境畜牧团场采取“定人、定畜、定草场、定任务、定领导”的办法,把生产经营地段作为边防管理的责任区,由生产单位分片包干。为更有效地巩固边防,每个边境团场确定1~2个连队与解放军边防站建立军民联防,定期召开会议,进行实地演练,互通情报,只要边防站一声召唤,边境农牧团场值班民兵即可齐装满员集结待命。197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出边境农场“经营山区,建设平原”的建设方针。在山区搞“五网”建设(生产基地网、后方基地网、通讯联络网、交通运输网、情报网),平原和山区建设搞好6个结合(平战结合、劳武结合、军民结合、城乡结合、地上地下结合、山区平原结合)构成统一、完整的边防体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区内边境线上的农牧场职工和民兵,不断创新屯垦戍边的实现形式,卓有成效地履行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历史使命。

#### (七) 加强民兵建设,开展军民联防

新疆寓兵于民,实行军民联防由来已久,1950年春,新疆和平解放伊始,一些地区匪患频仍,新疆分局、省人民政府号召各地剿匪自卫。匪患较重的10多个县陆续成立自卫队、治安队、联防队、民兵队等群众武装组织。这些群众武装组织的武器主要由政府发给,也有部分牧民自带枪支、马匹,县、区、乡

党委、政府领导兼任各级民兵负责人。1952年,新疆军区成立人民武装处,专管民兵工作。此前,各地民兵工作由部队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门兼管。1958年,在全国掀起大办民兵热潮的背景下,自治区党委同意新疆军区建设民兵组织的报告,新疆迅速掀起建立、发展民兵组织的热潮。根据新疆多民族、边疆地区特点,新疆军区确定先在进行过征兵、预备役训练、基干民兵编组试点并建立兵役机构的10多个县试办,再分期分批组建。新疆各级党政军机关先后成立民兵工作组,深入基层,进行宣传教育,社会上形成“当民兵光荣”的风气,适龄青壮年积极报名争当民兵。1959年,按照国家民兵暂行条例的规定,民兵分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新疆32个县组建民兵19个师、123个团、485个营、2027个连,总计37万余人,其中基干民兵11万人。1960年,新疆贯彻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精神,确定加强民兵建设,实现“全民皆兵”,新疆88个县(市)都建立了民兵组织,有95个师、530个团、2462个营、9846个连,民兵人数达到174.1万人,占总人口的25%,占适龄人口的56%。其中,基干民兵68.9万人,女民兵46.6万人,排以上干部8.4万人,还有一批专业技术民兵。受“左”的思想影响,新疆民兵工作出现追求高指标、形式主义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后经整顿,民兵数量精减,质量提高,领导力量加强。1963年对新疆31个县调查,民兵中党团员占11.3%;22个县的民兵干部,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占46.5%。1966年,全疆(不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兵人数下降到61万多人,后又有较大发展。

1969年,新疆执行中央“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各县市组织武装基干民兵团(营)。1970年5月,组建一批武装基干民兵团、营、连,武装基干民兵达数万人。1976年,全疆武装基干民兵发展到几十万人,组建包括地炮、高炮、骑兵、通信兵、侦察兵、防化兵、反坦克兵在内的专业分队,装备相应的武器器材,有火炮、火箭筒、通信器材等。武装基干民兵仍坚持劳武结合,不脱离生产,定人、定建制,每半月坚持1~3个半天军事训练。武装基干民兵团(营)建设采取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组编原则,因地制宜,与生产、行政组织相适应,便于领导和执行任务。武装基干民兵连分大、中、小三类,适应任务需要和装备情况,还组编骑兵、摩托分队;边境以步兵、骑兵和

反坦克、爆破分队为主。按照战备要求,组建民兵守备营,普遍成立民兵县大队,人数少者300人、多者1000人,一般为500人左右。

针对民兵既是民又是兵的特点,其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内容和每个时期的教育重点,由地方党委、政府及所在单位统一部署和组织;集中进行军政训练或战备执勤时,由军事系统统一安排教育内容。民兵的军事训练由早期的常识教育发展 to 比较正规的技术、战术训练;由单一的步兵训练发展到多兵种训练;由小型、分散的群众性练武活动发展到以训练基地为主的相对集中训练。1969年,根据边境地区形势,新疆民兵训练掀起高潮,主要进行射击、投弹、爆破、布雷等基础技术和战术训练;边境牧区还结合当地情况进行骑术、滑雪等训练。此外,边境地区、交通要道和预定反空降地域的民兵,还试制炸弹、地雷、手榴弹等。各地开展打坦克训练,组建打坦克小分队,学习用炸药包等土办法打坦克;演练在敌人可能入侵的地带设置和构筑反坦克障碍。与此同时,还进行用步枪、机枪打飞机、打空降训练和“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教育。1970年,新疆参训民兵17.7万余人。1972年,新疆训练重点是民兵干部和基干民兵,特别强调抓好民兵独立营、团训练,组织短距离拉练。1973年后,新疆贯彻总参谋部颁发的民兵军事训练纲要,实行周期训练和分级训练制度。当年,新疆训练专职武装干部1146人,民兵营连长9285人,武装基干民兵158066人,基干民兵11万多人。1974年,参训人数达41.6万余人。<sup>⑩</sup>游击战是新疆边防地区民兵训练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疆组织武装基干民兵进行以游击战(破袭战、伏击战、地雷战、麻雀战)为重点的“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和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演习,研讨袭扰敌人的各种打法。

(八) 把发展边境地区民兵组织作为民兵建设的重点

新疆边境地区建立民兵组织后,实行军民联防共同戍边,这一形式首先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开始。1959年3月,该县民兵已达3400余人,其中基干民兵1100余名,组织起军民联防。1960年,塔什库尔干、叶城两县成立1个联防大队、5个联防中队和23个联防班。1963年年初,自治区和新疆

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以边防部队、武装民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武装、当地民兵为骨干,各族广大群众为基础,实行军民联防。各边防部队普遍与驻地县、公社、农牧团场、生产队组成各种形式的联防指挥部、联防小组,有的地方还划分联防区。

新疆边境地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边防部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发现情况及时向驻军通报,封锁山隘路口,捕捉犯罪分子,维护边境秩序。196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边境一线组建农牧团场,形成长达1000多千米的边防生产地带,农牧团场中的民兵值班连、排,劳武结合,担负起戍边任务。1965年,边境地区民兵发展到8万人,其中基干民兵4万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组成巡逻小组683个,在295处山口、要道内(常年性的129个、季节性的166个)设防把守,经常执勤的民兵达2200多人,全年向边防站报告情况780次。1972年,边境地区的民兵力量有很大的加强。<sup>①</sup>

新疆边境地区的军民联防不仅民兵参加,一些地区还通过民兵联系广大边民,构建起更加绵密深厚的护边守边网络。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团结公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幸福农场和解放军迈丹边防站,在其联防的范围内,组织“老年检查员”、“三八妇女队”、“少年检查员”,把80%以上的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参加联防。北疆多以自然村、居民点为基础,设立固定哨卡,对来往人员进行验证登记;在重点地段,采取三五家一片,片片相连,定人定点,生产兼守边防。南疆根据地形重点设防,以联防小组为核心,军民密切协作,分工负责,整个防线联成一片,有情况及时迅速反应。

新疆边境地区民兵守卫边防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建立固定哨位、哨所。常年性、季节性哨位,实行定人、定位、定交通工具制度。为防敌潜入潜出,在重要通外山口、山沟、沙丘等偏远地带,分期分批建立百余个固定哨所,配合边防部队和公安机关加强对边境控制。哨所民兵根据情况制定作战方案和执勤制度,修建工事等防卫设施,有条件的还劳武结合,边执勤边生产,每天执勤民兵有几百人。多年来,哨所执勤民兵先后抓捕外逃分子数十人,查获非法进入禁区人员数百人,捕获外国特务20余名。发现外国武装军人、飞机越境,及时报告边防部队。皮山县桑株公社18大队民兵连,守卫8个通外山口,

10多年来捕获各类越境人员34名,破获各类案件38起,被誉为“昆仑雄鹰”。二是组织放牧点。中苏边境西段有的争议地区是我国传统放牧地带,但每年放牧都遭到苏武装军人的无理干涉和阻挠。各地在放牧季节组织民兵放牧点,对苏方干涉、挑衅、破坏生产的行为进行说理斗争。1968年12月至1969年3月,吉木乃县设在别尔克乌地区的民兵放牧点,同入侵的苏联武装人员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斗争。苏方先后出动武装军人740余人次、装甲车130余辆次、直升机25架次,野蛮威胁阻挠我牧民正常生产。民兵不畏强暴,挫败苏军一次又一次的挑衅,维护了祖国尊严和领土主权。<sup>②</sup>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新疆参加军民联防的民兵经常保持在1万人至2万人左右,是守卫边防的一支重要力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民兵和群众,守卫边防的意识很强,有效控制着通外山口要隘。虽然牧民居住高度分散,但一有情况能在几个小时内封锁全部要道山隘。1970年和1971年该县民兵捕获外逃分子13人。1975年,两名特务潜入,群众发现后及时报告,2小时内出动5个民兵连560余人和2000余名群众,封锁全部通外山口,陷敌于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吉木乃县达乌汗防区的哈萨克族民兵和群众,一边生产放牧,一边承担着观察、巡逻、盘查任务。1967~1976年间,捕获外国特务1名、外逃分子24名,挖地道5000多米,在要隘处修防御工事,制作炸药、石雷等。据不完全统计,1968~1976年间,全疆边境地区民兵共捕获外国特务81名,外逃人员80余名,拦回牲畜7000多头(只)。阿里地区日土县甲冈民兵排,自1964年组建后,同当地边防站配合,捕获外国特务7起18名,击毙叛乱分子9名,劝阻外逃分子和被胁迫群众多起,截回牲畜8000多头(只)。1971年,阿里地区革吉县亚热区前进公社组成以民兵为主的武工队,追歼一股叛匪,不怕牺牲,不顾疲劳,日夜兼程,苦战5昼夜,歼匪21名,缴获枪支9支,其他武器装备数十件,追回牲畜510头(只)。<sup>③</sup>

1976年,全疆边境地区有187个民兵连、19.5万多人与边防部队实行联防,建立了经常性民兵固定哨位和季节性哨所,以及对空观察哨。联防单位在边防委员会(边防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实行

健全的工作制度。边防站(边防连)与驻地农垦团场、公社、林管站、牧业队、派出所组成联防区,成立联防领导小组,建立会议制度,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联席会议除传达学习上级指示、通报,主要是研究联防区边境上出现的问题,人、畜管理情况,提出加强边境管理的意见、措施等。边防部队还与当地派出所建立联防协同关系,沟通信息,强化协作。许多联防组织还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制。如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各公社民兵连和生产队民兵排都固定有专人、专马负责通信联络;吉木乃县根据牧民流动性大的特点,分别建立常年、季节和临时等三种联防组织,采取放牧时定人、定畜、定草场、定哨位、定任务的办法。为便于统一指挥,一些地方按需要划分联防区,打破县与县、团场与团场、公社与公社、地方与兵团的地域、行政界限,提高联防工作效率。<sup>④</sup>

开展边防斗争和维稳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疆沿边地区各县市的各族民兵和边境居民群众,作出了特别的贡献。尤其是伊犁、塔城、博尔塔拉、阿勒泰等地的兵团边境农场及其民兵、职工,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富有成效地参加了擒敌防特、反对蚕食、处置“5·29”伊宁市暴乱、保卫伊犁区党委和伊犁州人委等一系列重大斗争,在当代新疆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㉖㉗㉘㉙㉚㉛㉜《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上) [M],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第258页、第259页、第296页、第323页、第335页、第395页、第494页,第133页、第158页、第174页、第186页、第187页、第188页、第189页、第209页,第248页、第256页、第260页、第266页、第275页、第276页、第282页、第284页、第285页、第288页、第289页、第290页、第294页、第295页、第297页、第299页、第300页、第304页、第305页、第307页、第322页、第328页、第330页、第334页,第339页、第357页,第156页、第201页、第227页、第238页、第258页、第267页、第277页、第288页、第292页、第294页、第298页、第375页、第403页、第412页、第446页、第448页、第476页、第478页、第490页、第

144页、第176页、第211页、第216页、第220页、第222页、第266页、第298页、第299页、第301页、第307页、第328页、第331页,第285、第367页、第396页,第141页,第278页、第289页、第296页、第312页,第370页、第378页、第382页、第399页,第295页,第187页、第190页,第214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97页,第278页,第287页、第289页、第296页,第298页、第299页,第340页、第359页、第427页,第352页、第354页、第384页、第418页,第361页、第367页、第369页、第388页、第402页、第408页、第420页,第483页、第493页、第510页、第511页,第275页、第277页,第183页、第189页、第202页、第211页、第222页、第235页、第252页、第280页、第291页、第309页、第320页、第330页、第348页、第355页、第356页、第368页、第393页、第397页、第431页、第455页、第511页、第513页、第516页,第177页、第203页、第210页、第226页、第276页、第295页、第303页、第312页、第317页、第329页、第339页、第361页,第363页、第376页、第476页、第485页、第495页、第496页、第509页、第516页,第177页、第204页、第232页、第235页、第238页、第257页、第268页、第475页、第480页、第481页、第482页,第255页、第333页、第378页、第396页、第442页、第460页、第478页、第497页、第502页,第290页、第467页。

⑩⑬⑱⑲⑳㉑《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 [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第231页,第239页,第257页、258页,第277页,第177页、第203页、第210页、第226页、第276页、第295页、第303页、第312页、第317页、第329页、第339页、第361页,第363页、第376页、第476页、第485页、第495页、第496页、第509页、第516页。

⑳《新疆工作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第233页、第238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新疆通志》(第28卷) [M],《军事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页,第7页,第812页、第813页,第806页、第810页、第816页,第324页,第824页,第823页、第824页,第324页。

㉝㉞㉟《新疆通志》(第37卷) [M],《生产建设兵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9页,第726页,第727页、第728页。

(责任编辑:李爱民)